我们永远铭记

——湖州抗战记忆（上）

一群孩子的『飞机救国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在“航空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的感召下，杭州及周边地区的小学生们也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救国重任，发起了“储金造舰”活动，号召同学们省下零花钱，为祖国捐飞机。

1932年5月9日“国耻日”[1]，清晨的阳光洒进吴兴绚业小学的教室，琅琅读书声格外响亮：“我们要养成群性来救国！我们要练成毅力来救国！”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正是孩子们在朗读学校的“救国训条”。为了铭记国耻，激励斗志，吴兴绚业小学在这一天正式成立了中华儿童储金造舰救国协会吴兴绚业小学支会，拉开了募捐筹钱的序幕。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自主管理和责任意识，学校精心组织，让学生们自行选举产生管理生和学生代表，负责整个募捐活动的运作。管理生负责登记、统计和公布每日、每周、每月的捐款情况，学生代表负责决议学校储金支会的重要事务。

捐款储金活动中，孩子们纷纷掏出自己零花钱，投入储金箱，铜板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短短一年多时间，600多名学生捐了700多元钱。1933年7月，绚业小学从储金中提取了120元交给县教育局，并由县教育局转交省教育厅，作为“浙学号飞机”捐款。

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项活动又出现了波折。1933年冬天，由于杭州捐款成效不佳，便向省教育厅申请停止储金活动。这个消息无异于给绚业小学的师生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但绚业学校师生们不甘心半途而废，冷静之后，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当时政府正在销售为募集资金购买飞机的“航空建设奖券”。经过多次激烈讨论和慎重考虑后，绚业小学师生们用剩余的钱购买了70余张奖券，如果中奖就能买飞机，不中奖也是捐钱给国家造飞机，这一次，他们要换一种方式“飞向蓝天”。

1934年4月27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师生们购买的奖券中了二等奖，奖金高达十万元！

随后，绚业小学用七万元订购了一架意大利产的战斗机，命名为“中华儿童号”。飞机尾翼两侧“儿童号”的字样十分醒目，机身前端两侧分别写着“群毅救国”“用固我圉”八个大字。“群毅救国”就是团结勇毅救国，“用固我圉”就是用这些飞机来巩固国防。

次年的儿童节，绚业小学师生代表受邀参加了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的献机典礼。八架新飞机整齐排列，最前面的就是“中华儿童号”，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典礼上，绚业小学以儿童救国会名义制作了2000枚“购献飞机纪念章”，典礼后还刊印了《中华儿童机特刊》。《申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

第二天上午10点，著名飞行员高志航驾驶“中华儿童号”飞抵湖州，并在绚业小学上空作飞行表演。湖州上万人聚集在学校旁的公共体育场观看了表演，银色的战机冲上蓝天，在阳光下划出优美的弧线，欢呼声和鞭炮声响彻云霄。

国难当头时，吴兴绚业小学的师生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爱国不分年龄，担当不论大小。当每个普通人都能尽己所能、持之以恒，就能汇聚成改变时代的力量。

注释

[1]五九国耻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条款。随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以警醒国人勿忘屈辱、奋发图强。

楂树坞下的丰碑

1938年3月26日清晨，吴兴县弁南乡（今属吴兴区妙西镇）楂树坞的晨雾还未散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25岁的王文林握着驳壳枪，正指挥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的部分队员向树林深处转移，听见身后传来杂乱的呼喊声——众多“红枪会”会徒举着红缨枪，正从山梁上涌来……

王文林1913年出生于河北保定，后来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他毅然放下书本，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东北抗日义勇军[1]赵尚志部。在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他逐渐成长为坚定的抗日战士。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党组织为开辟青浦、松江等地工作，命王文林、彭林赴青浦组建中共青浦中心县委，由王文林担任书记。受战局影响，两人未能成行，辗转至杭州。在听闻嘉兴沦陷后，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他们临时决定赴吴兴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王、彭二人抵达湖州城后，在金婆弄找到自沪回乡的地下党员贵诵芬。说明来意后，贵诵芬陪同王、彭二人前往潘店（今属杨家埠街道），认识追求进步、要求抗日的郎玉麟。在团结抗战的大局下，大家很快达成共识，立即着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王文林的建议下，他们先在潘店成立“流亡抗日工作团”，散发油印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战时消息》。11月24日湖州城沦陷后，他们转移到安吉梅溪，开班“抗战青年训练班”，由王文林主讲政治、民运课，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及民运工作。12月，王、彭二人还介绍郎玉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党支部，王文林任书记。

在王文林的主持下，党支部研究了筹建抗日游击武装的问题。经过积极筹备，1938年元旦，在潘店村西面的铜盆寺，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宣告成立，这是浙西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为政训员兼党支部书记，王文林天天跟战士们在一起，不仅练习战斗技能，还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齐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这支被群众亲切称为“郎部”的队伍，活跃在吴兴、长兴、安吉交界的山区。

但在全民族抗战初期，浙西局势混乱复杂，“郎部”的发展壮大经受了各种困难和挑战。1938年3月，“郎部”先后两次被“红枪会”袭击。第一次，彭林等人率部分队员在瑞祥斗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时，被长兴鸿桥的一股“红枪会”会徒袭击，全部人员和武器被扣押。第二次，王文林率部分队员从天目山返回楂树坞，遭到来自龙溪乡的数百“红枪会”会徒袭击。

在第二次被袭中，为保存抗日武装力量，王文林率民运组女同志和体弱同志先行撤离，郎玉麟、彭林则率主力转移。但没想到，王文林等人刚撤出村子，就发现已经被部分“红枪会”会徒包抄。为掩护主力转移和保护隐蔽在附近的队员，王文林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向部分会徒高声疾呼：“‘红枪会’的弟兄们，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强盗，大家的枪口要对准日本侵略者。请不要误会！请你们……”他的话还没有喊完，在反动头目的唆使下部分会徒便蜂拥而上，十多杆红缨枪往他身上乱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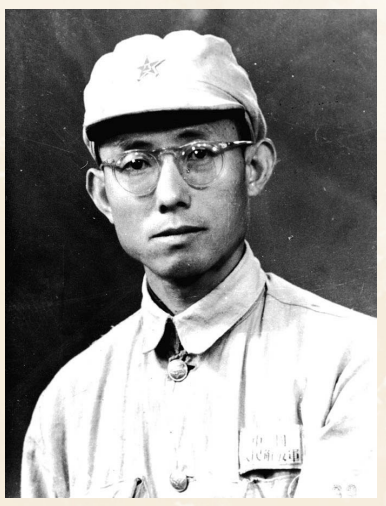
王文林烈士画像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文林仍顽强地扶着树干，断断续续地向会徒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下午4时，王文林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在莫家潭岭的一棵大树下，时年25岁。

注释

[1]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随后领导创建了多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这些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约3万余人。

郎校长投笔从戎



郎玉麟（1911—1996）

1937年11月，凛冽寒风如利刃般在湖州大地肆虐。日军的铁蹄步步紧逼，国民党官员望风逃窜，浙西杭嘉湖陷入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此刻，湖州西乡苕溪畔的潘店小学内，一位中等身材、文质彬彬的青年正望着窗外低矮的黑云，愁眉不展。他是潘店小学的校长——郎玉麟。

郎玉麟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书育人、建设家乡”是他毕业后的梦想。从1930年起，受到陶行知[1]“以学校为中心改造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郎玉麟回到家乡潘店村从教，并制定了新农村的建设计划。“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分兵进攻南京、杭州，中途又向湖州进攻。战火纷飞，家园沦陷，郎玉麟的梦想化作泡影。

正当郎玉麟为国家和民族忧心如焚之时，老同学贵诵芬带着王文林、彭林两位共产党人员敲响了他家的门。王文林曾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身东北抗日义勇军，不幸被捕入狱，出狱后又肩负党组织使命南下；彭林16岁便参加红军，是身经百战的军事骨干。

1937年12月，经王文林、彭林介绍，郎玉麟在一间简陋的房间内，郑重地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身许革命，斗争到底。

经过积极筹备，1938年1月1日，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部队，亦称“郎部”）在南埠铜盆寺（今属妙西镇）成立。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训员、党支部书记，彭林任参谋，这是浙西地区第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是当时浙西一支影响较大的武装。

游击队成立三四天后便接到情报：日军正在南埠“扫荡”。郎玉麟、彭林、王文林迅速碰头商议，为振奋民族士气、打开浙西抗日局面，决定主动出击。彭林凭借军事经验，迅速制定出缜密的作战方案。夜幕降临，游击队员们手持步枪、腰别手榴弹，分成三路，在熟悉地形的战士带领下，悄然逼近日军驻扎的南埠头村。随着郎玉麟一声令下，数枚手榴弹如流星般划破夜空，在日军营地炸开朵朵火花。骄纵的日军没有想到这里会有抗日武装，营地顿时乱作一团。训练不足、装备较差的游击队也见好就收，趁着夜色掩护迅速撤离。首战零伤亡的战果，让这支年轻的队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

次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卷土重来。但游击队早已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当日军毫无防备地踏入伏击圈时，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阵脚大乱。随后，游击队迅速隐入山林。日军摸不清虚实，只得拖着伤兵、抬着尸体，狼狈撤回城内，从此不再轻易下乡骚扰。

南埠头村一战，打响了“郎部”抗日第一枪，也标志着胸怀“教育救国”梦想的郎校长成长为一名手握武器的抗日战士，同时也拉开了党领导下的浙西敌后抗战的序幕。

注释

[1]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留美归国后，首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1939年建育才学校收难童，毕生献身平民教育，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从西湖到莫干山

1937年3月的杭州，春寒料峭。迎春花初绽枝头，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上银装。3月24日，《东南日报》头版刊登了蒋介石抵达杭州的消息，与这场反常的春雪一起，在街头巷尾引发诸多揣测。

次日的黄昏，西湖在暮色中渐归沉寂。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北山街的澄庐别墅。车门开启，周恩来率先迈步而出。他身着深色中山装，面容清癯却目光如炬，眉宇间凝聚着从容与坚毅。同行的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张冲紧随其后，三人此行肩负着打破国共谈判僵局、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使命。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但蒋介石仍坚持“编共而不容共”的立场。尽管国共谈判已在西安启动，但由于国民党缺乏诚意，历时月余仍陷僵局。3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明确指示：“可声明在西安已无谈判余地，须面见蒋氏方能解决。”

澄庐别墅内，蒋介石身着深色长衫，已在会客室等候。尽管此前他借返乡休养之名试图重整态势，但在周恩来坚定而从容的握手间，仍能感受到几分不易察觉的局促。

周恩来开门见山，表示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是基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三大纲领的共同追求。他强调，此次是为四万万同胞福祉而来，求的是救国图存的民族大义。他的声音平和却有力，在静谧的客厅里清晰可闻。

谈判中，蒋介石时而承认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肯定中共在推动和平运动方面的作用，时而又强调“不必提与国民党合作”，只需与他个人合作、拥护他的领导。窗外积雪未融，西湖静谧如画，而谈判桌上的气氛却时紧时缓。

面对僵局，周恩来沉着提出六项口头声明[1]，建议两党共同制定统一战线纲领，并一再申明共产党在组织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在他的据理力争下，蒋介石最终口头应允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同意由中共方面起草共同纲领。

由于会谈高度机密，后续谈判数次变更地点。从澄庐别墅到满觉陇烟霞洞，最后移至莫干山白云山馆。莫干山上，竹海苍翠，云雾缭绕。二人在张冲陪同下同上莫干山继续磋商。

张冲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仅在谈判中给予周恩来诸多协助，更在生活与安全方面提供保障。周恩来后来多次表达对张冲的敬重，称其“为能始终其事”，并留下“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几所奔走，靡不与闻”的评价。

这场从西湖延伸到莫干山的谈判，持续了整整五日。虽然最终达成的只是口头协议，但却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蒋介石首次口头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为后续正式合作奠定基础。

回望历史，这场谈判标志着国共两党从十年内战走向联合抗日的重大转折，为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打开了突破口。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湖之畔到莫干山顶，这场春雪中的谈判最终融化了持续十年的内战坚冰。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原则立场，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注释

[1]六项口头声明：为确保红军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合法性，周恩来提出：1.陕甘宁边区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不能被分割；2.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到4万余人；3.在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指挥机关；4.国民党不能向红军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的防地需要增加。

本版内容由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